

“关于这种态度，据说孔子便受过老子的一顿责备，“聪明深察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这种态度是秦汉以后的儒生、博士所丧失了的。

……关于这种态度，据说孔子便受过老子的一顿责备，“聪明深察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这种态度是秦汉以后的儒生、博士所丧失了的。……

……关于这种态度，据说孔子便受过老子的一顿责备，“聪明深察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这种态度是秦汉以后的儒生、博士所丧失了的。……

……关于这种态度，据说孔子便受过老子的一顿责备，“聪明深察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记·孔子世家》）。这种态度是秦汉以后的儒生、博士所丧失了的。……

第九章 周代的商人与自由民

第一节 周代商业资本的路线

文明使一切已确立分业加强而增剧，尤其是更激成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这里或者如古代，城市对农村的经济支配，或者反之，有如中世纪，农村握有城市的经济支配权，此外加上第三种为文明所固有的有决定意义的分工：即创造了一个不参加生产事业惟从事生产物交换的商人。

——《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参看中文译本，人民出版社版，一五九页。

商人 是依着货币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当金属货币已经使用，藉此又发生了支配生产者及其生产物的新手段。那秘藏一切其他商品于其神秘怀中的商品之商品，已被发现，谁比其他的人多占有些呢？商人。

——同上，一六〇页。

这正像《战国策》顿弱所说：“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 是也，无把铤推耨之劳，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 者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 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

希腊罗马的显族阶段，由于土地私有，货币已经成为社 会的权力手段，比起荷马所述的英雄时代的用牛来和其他物 品相比，有了显著的进展。

在中国，情形很不一样。殷代是有关于货币的简单记载 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卜辞的贝作根据，便无法证明那时的 货币的作用超出了等价形态的范畴。据周金的记载，西周社 会很早就有锡贝的事实，还有“取遗五孚”（《扬殷》），“取 贵卅孚”（《毛公鼎》）等等。《留鼎》还说，“用徯延赏丝五 夫用百孚”，这是西周中叶的事。货币已经成为储藏手段，具 备了所谓神秘的拜物性。

《周书·酒诰》说：“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 母”，这是不是专业商人，单就文字来看是无从知道的。

《诗经》里的材料主要的是农事、戎事、国事、禋祀，很 少关于商业的。写作很早的《周颂》，丝毫没有商业资本的影 子。变风变雅所说是西周末春秋初的事，不代表西周的情况。

这显然是由于西周有严密的“周索”，主要生产资料的土 地限于氏族贵族的封锡，阡陌封树，只有氏族贵族的合法承 继，没有私有买卖，因此作为权力手段的货币就难于走上历 史的舞台。换言之，土地既然不成为商品，那末，商品的商 品就不能取得它的历史职能。这也是西周没有显族贵族的必 然结果。

把《诗经》的“亶侯多藏”（《小雅·十月之交》），“如

贾三倍，君子是视”（《大雅·瞻卬》），作为西周末叶的材料 来看，这种商业的专业性，在土地范围以外的其他贸易，是 极其狭隘的，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专门的商人，商业行为还局 限在亶侯君子的小天地里，很难说有商业资本。

这不是说西周没有商业，只是说没有希腊罗马国家成立 以后那样繁荣的商业经济。主要的贸易行为只限于氏族之间， 《诗》、《书》所谓“君子是视”，“孝养父母”。古代希腊 的社会里，小生产者和自由民的小土地，由于显族贵族的大土地所有者的侵并，使他们逐渐没落。贵族 所造成的货币资本关系，是所谓“债权人 和债务者的关系”，使货币表现出很大作用。西周是没有这样的货币经济的，走 的是亚细亚的路径。

春秋时代，在财富“向下集中”的历史转变中，“富子” 大夫和“私肥”的陪臣，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但是商业还受 着土地国有制的限制，开始还是氏族贵族的专利（“工商食 官”）。

西周末春秋初，郑桓公用国君 的资格和土族立盟，“尔无 我叛，我无强贾”（昭十六）。

“既徂我德，贾用不售”（《邶风·谷风》），这表示“以 物易物”的困难。

“民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卫风·氓》），这首诗大概有错简，因为和后面的句子没有关联。这 显然是落后的土族拿布来换丝，但是由于族和族之间的仇恨， 把对方认作奸细。

我们根据史料推断，商业开始发展是在春秋中叶。那时 富子大夫出现，二都耦国或一国多政代替了“经济的赘疣”

（诸侯城市——国），当时是“无礼而好陵人，恃富而卑其上”（昭元），“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昭四）。因此，在同一国内，小城市并起，周室是破坏了，但是市场关系却显然发展了。“市井之臣”，“商居市”，“工贾不变”，“庐井有伍”，这些都表示商业经济。尽管先王之制“人有十等”，其中并没有商人，商人却是在客观上出现了。因此贵族可以“室于怒，市于色”（昭十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昭二十）。就市和室以及市和鄙相对的记载看来，可以知道商人是和奴隶一样低贱。

借贷关系也在同时发生。在国内公私可以互贷。如“齐……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文十四）。“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国之材人无不事也”（文十六）。“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襄九）。春秋各国相互间的“乞贷”，“乞糴”，不但成为常事，而且有了国际公法（盟约）的规定。

当时的国内商业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受着束缚，国际间贸易贿赂却比较可观。春秋末叶就有“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富商往来各国，贩运珍宝，但是还有人指责他们是“无大绩于民”（《国语·鲁语》）。他们自认很卑下，如“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成三）。

春秋国际间的“贿”是给国际商人以便利的，如子产所说“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襄二十四）。

《左传》所记的郑商人（商人这个词，古文献里不多，可能是郑国的商族人）弦高，做了一件大事，他用牛皮犒秦师，把秦国袭郑的消息报告给郑国。这位弦高显然不是商人，好像国际间谍。但是这事件看来，可以知道国际贸易是发达起来了。

从西周一直到春秋初年，只有按照族的贵贱所规定的上下之别，因此商人在十等的分业里没有地位，被看作“市井小人”。这种分类后来破坏了，“为礼卒于无别”，这也就是说社会的别成了多元的了。“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宣十二）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有些人不禁发生“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昭二十五）的感慨。卑贱的商人，到了末世，竟为君子所眼红。这是半显族阶段的现象，所谓“霸者”，便挟带着显族气味，因为如果有功，庶人工商都可以免除卑贱身分（哀二）。司马迁评论说：

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正义》解作掌铸货币），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功。故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小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史记·货殖列传》）

这种议论，虽然含有汉人的观点，但是也很接近于事实。《史记》说春秋末叶有两个著名商人，计然和子贡。

计然（一）计然对越王勾践献策说：“平糴齐物，关市不乏，治

国之道也。积著〔贮〕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商品流通与货币媒介〕。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商品变态〕。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供求律〕，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

还有范蠡改名换姓〔朱公〕，交易货物，四通诸侯，“治产积居”，“三致千金”，“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同上）。

（二）“子贡既学于仲尼，……废著〔居〕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同上）。孔子也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

因此，春秋的商业贸易，在国内，仍然是“君子是视”，大夫陪臣做了货币蓄积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国际易货，商业资本没有发达。当时国际经济很不平衡，有无相济和战争掠夺并行，如司马迁说：“山西饶材、竹、穀、纆、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柁、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正义说，出铜铁之山方千里，如围棋之置也。〕……故物贱之微贵，贵之微贱”（《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特别是战国末年，却不同了。商业成了专门分业，商业资本也显然发生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当时深耕易耨，普遍要求铁器的劳动工具，殷富的商人，多靠铁来做生意，而且他们不属于氏族贵族，因此在商业行为上可能比较自由。

贝、绩、牛羊、钱、铲、谷物、刀布等，都成为交换流通的手段。春秋周景王二十一年才铸“大钱”。到战国便有铜

制的蚁鼻钱，黄金也成为权力手段跳上历史舞台，如《孟子》“王赧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赧七十镒而受，于薛赧五十镒而受。”

如猗顿，用盐铁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埒富。

白圭，……当魏文侯时，李悝务尽地力，……白圭乐观时变，……岁熟，取穀，予之丝漆茧；凶，取帛絮，与之食。……积著率岁倍。……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天子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家致富数千金。

鲁人……曹丙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赈贷行贾遍郡国。

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末年，都鄙制度破坏了，经济赘疣的诸侯国都，被新的经济都市所代替，据《史记》说，齐之临淄，赵之邯郸，魏之大梁，秦之咸阳，楚之郢，都是大贾小商出入的地方。

“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比千乘之家”。他们虽然不是公族，但是“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同上）。

各国的情况是：《史记·苏秦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货殖列传》又说：“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这是变化了的周俗，鲁俗也一样变了。《货殖列传》说，“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周鲁是周公之典所在的国家，还是这样趋利，其他可想而知了。

齐国是盐铁之乡，《战国策·齐策》说：“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又如魏国，《淮南子·人间训》说：梁之富人，“家充盈殷富，金钱无量，财货无赏”。又如秦国，吕不韦阳翟大贾，“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吕不韦列传》），后来做了秦国的大政客。

有商业资本就有高利贷。孟尝君收债的事，《史记》和《国策》都有很详细的记载。他因为借他的钱的人不能付利息，便叫他的食客冯谖去收债。

孟尝君是为了经营高利贷来养食客，以作政治活动。吕不韦是以阳翟大贾的资格，行贿使子楚得立为秦太子的嫡嗣，并且把孕妇送给子楚（生秦始皇），送金物，跳上了秦国政治舞台。他有一段做交易的故事。

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即子楚），归而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战国策·秦策》

这样看来，土地私有买卖的利得，不如商业，商业的利得又不如做政治投机；但是如果产生土地私有，商业和政治的利得是很难期待的。战国的纵横家就是代表了当时商人阶级的政派，可参看我和几位同志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第二节 周代自由民（国人）

周代有“士”的一级，这在西周是武士，在春秋是邑宰。孔子的弟子做邑宰的，有闵子騫——费宰，子游——武城宰，冉求——季氏宰，子羔——费宰，仲弓——季氏宰，子夏——莒父宰，子路——季氏宰。

就“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看来，士在十等人之内的地位是不定的，因此礼和法都能对他应用。

在贵贱有序的社会里，和“士”的地位相近却没有列入等级的，叫做“国人”。“国”既然是城市性质，“国人”显然是市民，即自由民。这并不是形式的推理，以下是事实的根据。

在成王时代周金铭文里有“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御，国（域同国）人，伐东国×戎”（《班毁》）。西周宣王时代的器皿有“邦人、正人、师氏人”（《鬯盃》）。

邦、国同义，后一器的邦人应当是前一器的国人，只是前者国人在后，后者邦人在前罢了。国人既被派遣出去征战，便很像希腊的自由民。从国人在金文中的序位看，他既不是贵族，便和市民差不多。西周信史如《周颂》里，没有提到国人或邦人，国人在

氏族贵族的社会，数量是不多的。

《周书》提到“国人”的地方，有“文王蔑德降于国人”（《君奭》），“邦人大恐”，“王出郊，……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金縢》）。《金縢》是有问题的文献，但是《史记·鲁周公世家》曾转录这篇文章，并且将“邦人”译作“国人。”

《诗经·国风》里“国人”就多了。“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曹风》）。在《陈风》里曾指出国人的言论有一定的威信。

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虽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国人”的谤言，在周代好像希腊罗马自由民的议政，相对地表现了古代社会的民主主义。“谤”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事，正如召公谏周厉王，解释谤的民意性质说：“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史记·周本纪》）。

没有自由民，便不会产生希腊的悲剧艺术，同样地，没有“国人”，便不会产生西周末春秋初中国的古代悲剧诗歌（变风变雅）。原因就是有了相对的民主。

《史记·周本纪》所载厉王监谤的故事，表现了“国人”在政治运动中的地位。但是我们却不必认这一运动是国人所独力进行的，宁可以说是“国人”有些倡导的作用。

“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

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奭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史记》所载幽王触“国人”之怒的史事，是有重要意义的。幽王为数举烽火，其后诸侯不信，诸侯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怒。

到了春秋时代，“国人”还能够立猛为悼王。凡国政大事，国人莫不参与，所谓“与国人交止于信”（《论语》）。战国时代，国人的地位更重要了。如孟子说：“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又如“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鍾，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下面我们且举子产的惠人政治对于国人的两个例子：

郑国子驷当国的时候，公族之间发生了大变乱，后来因为“国人助之”，把族乱平息了。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不准议朝政。当时国中很不满意载书。子孔想杀不顺从的人。子产却劝他把载书烧了，平息大家的愤怒。子孔不以为然。他说：“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子孔“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襄十）。

子产当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昭六）。他重视“国人”的舆论。在他作丘赋的时候，“国人谤

之，曰，‘其父死于路，已为蚤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云，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昭四）。他把“国人”看得和诸侯一样，曾说：“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诸侯。国人所尊，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昭十六）。

因此，他的开明政策，是把“国人”的舆论当作药石，把“国人”看作先生。他答覆然明关于乡校里议论执政的一段话（见本书第二三九页），很像孟子所谓“不信仁贤，则国空虚”的论断。

这不是子产主观上要这样，是因为“国人”在春秋时代确实占着重要地位。下面我们择要列举几类国人参与国事的史实，来做证明。

（一）国人出君弑君：

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

晋人攻莒，纪公……多行无礼于国，仆（其太子）因“国人”以弑纪公。

晋人攻齐，齐人逐之，晋人攻齐，齐人逐之，晋人攻齐，齐人逐之。

晋人攻齐，齐人逐之，晋人攻齐，齐人逐之，晋人攻齐，齐人逐之。

晋人攻齐，齐人逐之，晋人攻齐，齐人逐之，晋人攻齐，齐人逐之。

（二）国人参与公族内乱：

宋“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

郑”。

“国人”奉[宋]公子鲍以因夫人。

公子驹率“国人”盟于大宫，遂从而尽焚之，杀子如、子驪、孙叔、孙知。

曹“子臧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乃懼，……乃反而致其邑”。

宋“‘国人’逐彘狗，彘狗入于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懼，遂奔陈”。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

卫“‘国人’召宁子，宁子复攻孙氏，弑之”。

齐“庆封……使‘国人’助之，遂灭崔氏，……而尽俘其家”。

宋“辰曰，……吾以‘国人’出，君谁与处？”

鲁“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太子，国人始恶之”。

（三）国人向背的重要：

文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

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国人始恶之。

邾大夫朱儒，自安于夫鍾[邑]，“国人”弗徇。

——文十一

宋“昭公……曰：不能其大夫，以至君居祖母，以及‘国人’，……不如死”。——文十六

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国之材人无不事也。

——同上

鲁“‘国人’诵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襄四

楚“郈宛直而和，国人说之”。——（参看昭二十七，楚乱；国人参与之故事）

（四）安定国人：“……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子产立公孙洩及良止以抚之，乃止。

——昭七

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国人）。——襄九

宋景公无子，……大尹常不告，……“国人”恶之，公……卒……三日而后“国人”知之，……“国人”施〔罪〕于大尹，大尹……奔楚。……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哀二十六

这样看来，“国人”无疑是“自由民”，只是他们参与“国”事的形式，不像希腊古代那样严整罢了。

希腊社会的自由民是氏族贵族制崩坏以后的市民，后来被显族经济所侵吞。中国的自由民却是在显族难产的过程中，逐渐取得社会地位。在春秋的族内战争里，参加的国人，显然不属于氏族贵族，但是由于贵族内部的矛盾，他们可能成为不合法的小生产者。到了战国，这种人一部分大约转变成

为职业的文学之士或食客、策士，因为他们不属于贵族的宗统，所以说“士无定主”。苏秦便是在“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的环境中抛弃了商业去做游士的。